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兴存考析

魏建克 高尚斌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私营商业在陕甘宁边区经历了地域性的独特发展过程,在地区分布、发展比重、商品种类和业务性质变化上反衬出边区政府追求发展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念。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边区政府实现了从放任自流——管理困境——到统一领导的发展转型,使其成为边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出私营商业战争年代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私营商业 发展变迁 政府管理

一 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以来,私营商业^①在陕甘宁边区已经作为了一个历史的存在。由于封建经济的落后性,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微薄的农业收获,还不够完粮纳税”^②;“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经常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等灾害”,可谓“十年九灾”,“一遇旱灾,真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颗粒不收”。^③从而导致了“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贸易和交通以及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交通,是最原始的和零星的”。^④农村经济的封闭性和农民购买力有限,私营商业的发展领域只能蜷缩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且以“进口一些洋布、化妆品、玩具等外来奢侈品”^⑤来换取当地的土特产、盐和皮货等,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地主豪绅、国民党高官及其家属的需要。

(一) 私营商业的起步与全面恢复(1937—1940年)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剿,原本在个别地区^⑥存在的棉花种植、采桑养蚕、家庭牧畜几乎完全停顿,使在个体家庭手工业基础上形成的私营商业遭到了很大冲击。

① 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边区、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6期);马军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原因》(《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五章和第十三章中对私营商业的研究。

② 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3页。

④ [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⑤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⑥ 如延长、延川、固临东三县的棉花种植,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的采桑养蚕,以及边区农户散养的牛、羊等,形成了棉织产品、丝茧品、皮毛产品等的对外出口。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推动边区经济的发展,实行了修养生息政策,对商业经营也作了相当的改变。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中指出:完全取消对苏区工商业的一切税收,“关税和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不仅苏区内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而且“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的到苏区来营业”。^①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仍“是一个地广人稀相对落后之区,无工商业的必要基础,农业的耕种还是老的方法,无科学的技术基础”^②,而且“自给经济尚未建立”^③,日用品主要依靠外来的输入。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形势稳定,“机关学校扩大,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④,对商业的需求成为边区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内容,苏维埃政府积极恢复与开设农村集市,促进物资交流。处于边区南梁区的荔原堡集市开放后,对合水、西化池一带接近苏区的商贩采取欢迎态度,集市上出现了从白区运来的白布、蓝布、纸张、油墨、盐等货物。同时,边区的牲畜也开始恢复对外销售。中共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非常重视集市的商业活动,首先恢复了志丹原来荒废的市集,对商人不收任何捐税,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众的信任,各地商人闻讯不断涌来,私营商业发展欣欣向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全面的民族战争,争取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25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⑤的边区经济政策。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私人经营商业,奖励区外商人来边区经商的政策,以发展边区商业,积蓄抗日力量。1939年1月在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⑥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2月,在延安市生产动员大会上,李富春在《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中提出了:“欢迎全国工商业家到边区来投资,开展边区的国防经济建设。”^⑦同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再次明文规定了“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⑧的政策。为了有效的保障私营商业的发展,边区政府首先正确的处理劳资关系,一方面维护资方的正当利益,一方面逐步提高店员的政治地位,增加工资待遇。其次,取消了资本家正当经营的各种限制,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商人负担。再次,妥善安置返回边区的商民,帮助他们恢复营业,“对小本赢利之商户,均呈请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借贷,由其按期摊还”^⑨,同时积极鼓励商民到偏僻地区开设商业网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出入口贸易又处在绝对自由状态”^⑩,边区“商道畅通,金融基本稳定,商人负担极轻”^⑪的商业发展环境,为私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边区“新增加的商店约一千以上,尤以延安……增加更多”。^⑫到1939年,

① 《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另据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② 李富春:《生产运动》,《新中华报》1939年3月3日,第1版。

③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0页。

④ 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97页。

⑤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9页。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⑦ 《解放》,1939年2月第65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87页。

⑧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⑨ 《本市新市场——展期开幕》,《新中华报》1939年6月13日,第3版。

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0页。

⑪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87页。

⑫ 林伯渠:《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随着边区人口的骤增,消费量增多,城镇的购买力日见提高,处在边区以外的,如榆林、山西、河南等地的商人,纷纷来边区经商,他们带来布匹、纸张及其他日用品,贩回食盐、皮毛等边区土特产,获利甚巨。一些外地商人还同边区商人合伙,或者自立门户单独经营。私营商业的发展,推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处在边区中心的延安成为最大的商业聚集地。

私营商业的发展趋势迅猛。以延安为例,1936年有私营商店168家,1937年增加36家,1938年和1939年平均增加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已达297家。^①商店数量的增多,促进了新的市集建立。延安市政府筹建了南北两个新市场,“延安周边的安塞、定边、保安、曲子、新正、淳耀、宁县……也建立了30多个新市集”。^②在关中分区,从1937到1939两年内就建立了十几个集市,其中最大的马家堡集市,“每集参加者多达两千余人,上市的商品有羊绒、毛皮、棉花、土布、烟叶、药材等农副产品;牛、驴、铁木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洋布、燃料、肥皂、针线等生活用品。由于不纳税,交易便利……吸引了友区民众及商人也纷纷赶来参加交易”。^③随着私营商店的增加,商业资本也大幅度增长,边区开始出现了一些大商号和大型的私营“过载栈”^④,他们(如延安市的德盛玉京货庄、玉合祥货庄、山西十大家等)“拥有资金十万至百万左右:三边、三原、西安、天水等地,都设有分号,在西北他们像是结成了一张脉络的网,来吸引着徜徉在市场上的资本的血流”。^⑤

私营商业的繁荣,“对工人的需要逐日增加,所以不仅在基本上消减了工人失业的根据,而且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⑥与革命前相比,工人平均工资增加了15%—20%。

(二) 中小私营商户迅速崛起(1941—1942年)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施了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恢复中的边区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困难。尽管1941年初边区政府提出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方针,但对外贸易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枪杀行商,扣押运货商民,对过往行商、运货脚夫,轻则扣押,重则枪杀”。^⑦而且,“国民党封锁部队还经常制造谣言,恶意中伤边区政府,阻挡商民前来边区经商”。^⑧鉴于此,出入边区从事长途贩运的商民,畏于路途风险而裹足不前;边区私营商业中的大商户,几乎都是经营出、入口贸易的京货商和与过往行商有密切关系的栈行,且大都是外籍客商,在国民党统治区都有自己的商业据点或分店,也因运输成本剧增,亏赔不起,于是关门歇业,将资本转移到区外。如延安山西籍的“十大家”大商户先后将资本转向西安,米脂的大商户将资金转移到三原、榆林,庆阳走了20余家大商户,富县的大商号也因资金缺乏,货源不足而关门出走,边区私营商业中的大商户急骤衰落。^⑨

私营大商户的出走或停业,给小商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他们一方面根据政府提出的“发展工

①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0页。

② 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1940年2月18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89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90—91页。

④ 过载栈:是为边区之外的客商与脚户提供吃住和销售货物的地方。在当时的边区,按经营方式与资本活动分类,过载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主要靠批发商品及向边区以外进行商业活动,市场活动能力很强;一类是边批发商品边吃饭,但经营商业的规模较小;一类是专靠吃饭,就是小的过载栈。在当时边区商业的繁荣时期,仅延安市内就有18家过载栈,比较大的过载栈就有5家,总资本在70万元以上,占延安市商业资本相当大的比重。参见刘潜:《延安私营过载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9日,第4版。

⑤ 《新市场小影》,《新中华报》1941年1月9日,第4版。

⑥ 林伯渠:《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第23页。

⑦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05页。

⑧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06页。

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22页。

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①和较轻的征税^②等优惠政策,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正如一位商民讲到:“说老实话,边区的税比外边少而且轻,这是在外边做过生意的人所真正感到的。”^③另一方面,由于公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成熟和货源不足,在边区货源缺乏、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中小商人依靠其分散活动的的能力进行商业经营。例如,边区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农具的需求也推进了铁匠铺生意的兴旺,延安铁匠铺由过去的六家,变成了“现在的三十多家,……已经成为铁匠工业区”。^④新市场出现了“铁匠日夜赶制农具”^⑤的场景。所有这些,都促发了中小私营商业得以更加迅速发展,仅延安市商户就从1940年的297家,增至1942年的370家,两年内增加了80多家。绥德市也在两年内增加了中小商户27家。^⑥

中小商户的快速发展尽管存在很多管理方面的漏洞,造成了边区的金融物价波动,但它的发展为沟通边区物资交流、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增加边区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仅1941年延安商会就“购买救国公债104000元;募集教育经费4500元;运公盐45驮(每驮150斤,按200元计算),已完成9000元;缴纳营业税19万元”。^⑦

(三) 大商户的减少和中小商户的继续发展(1943-1945年)

边区的私营商业尽管经历了边区一度经济危机的影响,但边区政府对商业发展的重视使其一直处于发展中。1943年与1942年相比,延安私营商户增加了85家,绥德增加了71家,定边、靖边、临镇、富县等地的私营商户也有大幅度的增加。但实际上,由于边区政府管理的加强,统制了有些出口的东西,公营资本逐渐增大,再加上陕甘宁边区“内部市场上反对垄断,扶助中小商人”^⑧，“原来做出口贸易的大商人便走了”，“中小商人大大地发展”^⑨起来。集市贸易成为中小型私营商业最典型的表现,延安、关中、陇东等地的每逢集日,商贩流动,百货云集。合水、西化池作为商业的繁荣地,逢集的日子,“各种各样的小摊,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人群塞满了街道,潮水般的涌来涌去。商店的伙计忙得连烟都顾不上抽”。^⑩中小型商户的发展,成为边区私营商业的核心力量。

为了有效的对发展起来的中小私营商户进行领导与管理,从1941年到1943年,边区政府开始有计划的步步深入,对商户的经营和商会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造。私营商业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获得了健康发展,到1944年,“延安市有私营商店473家,资本达22亿元,比1942年增加103家,资本增加了15倍。同年绥德市的私营商店184家,比1942年增加73家。其他如定边、靖边、临镇、富县等地的私营商业这两年也有很大发展。……上述四个县共有私营商户486家,拥有资本12914万元,比1942年增加15.2倍”。^⑪边区政府通过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管理和领导,使私营商业

①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77页。

② 1939年底,边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边区征收农业税与商业税的决议》,提出在边区征收累进的农业税和商业税,1941年1月1日起,开征营业税,扩大了货物税税目。但与农民相比,商人的税收比例很小,负担也很轻,农民的税收负担率当时是25%,而中等商号的负担率只有12%(参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22页)。在同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中等商号的税收负担率达到24%左右(参见晋察冀边区所得税暂行办法(1939年9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30页)。

③ 王富才:《一个商民的意见》,《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第4版。

④ 狄艾曾:《延市铁匠》,《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第2版。

⑤ 《新市场铁匠日夜赶制农具》,《解放日报》1942年3月3日,第4版。

⑥ 数字据《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4页、299页编成。

⑦ 《延安市商会开会员大会:营业税决月中交清》,《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2日,第4版。

⑧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5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96页。

⑨ 陈云著:《陈云文集》(1935-1949)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⑩ 平野:《西化池繁荣了》,《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第2版。

⑪ 《延安市公私商店调查登记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430-431页。

发展纳入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轨道之上。

二 私营商业的地区分布、发展比重和业务性质变化

(一) 私营商业的地区分布

私营商业在边区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交通方便的较大城市，即区间贸易口岸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迅速；小城镇，尤其是边远地区商业仍不发达，偏僻的农村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立集市都是困难的”。^①在边区，商业发展的繁荣地带主要集中在延安、定边、靖边、临镇、富县等人口稠密和交通便利的稳定区域。以延安为例，1938年延安的商路已是四通八达，东出清涧、绥德直至山西的碛口，南经西安、河南可达汉口，西至陇东、北出定边可致宁夏、包头。1940年延安市私营商店已接近300家，在南门外的一条两里多长的山沟里，开始搭棚子、砌砖窑、起石屋，昔日的黄山沟变成了生意兴隆的“延安新市场”。经营的商品真可谓多种多样，如棉花、布匹、肥皂、染料等日用百货；铁木农具、锅、碗等杂货；食盐、木材、药材、皮毛等土特产；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以及香皂、香粉、烟酒之类的奢侈品，香烛之类的迷信品等。

相反，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商业呈现出发展不稳定的状态，绥德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地区。

表 1: 1937 年— 1941 年绥德市私人商业情况统计表

年份	商户数	头行户	二行户	三行户	四行户	五行户
1937 年	155	9	19	28	51	48
1938 年	118	11	9	15	38	45
1939 年	141	6	13	17	61	44
1940 上半年	73	6	8	12	29	18
1940 下半年	146	4	10	16	65	51
1941 年	125	4	9	13	51	48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注，行户的排名是根据商户每年生意大小定位为：头行、二行、三行、四行、五行五个等级，一般年生意交易额在10—15万为头行、5—10万为二行、2—3万为三行、1万上下为四行，低于5千为五行。）

从表1看，绥德市私营商业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从1937年到1941年，商户的数量基本处于递减状态，1938年比1937年减少了23.9%，1939年有一些增加，但还比不上1937年。1940年上半年更是减少了52.9%，下半年有些增加，但主要是小商户，1941年也同样减少了。出现不稳定的原因是绥德市私营商业的对外依赖性较强，同时又处在战争的交接地带，再加上本地对外出口商品的匮乏，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产品的存在。“与绥市相反，战前商业不甚发达的庆阳市、西化池、富县等对外口岸，由于食盐出口却表现的蒸蒸日上”。^②

(二) 私营商业在边区商业发展中的比重

私营商业的发展比重与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有着紧密联系，其发展比重是处在一个相

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92页。

②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2页。

对萎缩的发展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与公有商业的抗衡——处于劣势——辅助的演变路径。边区商业的发展包括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公营商业主要是依靠合作社来经营^①,其发展规模是非常有限的。抗日战争的爆发,私营商业在边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并且拥有很强的资本,几乎垄断了整个边区市场。但是,对于公营商业来说,直到1938年初,边区政府才决定建立一个公营商业机构。3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公营商店光华商店成立,成为新民主主义国营商业的雏形。到1940年,当时最大的公营商店光华商店,已拥有资金120万元,“其销售价格低于一般私商10%—20%,在客观上起了平抑物价的作用”。^②尽管如此,从1937年到1940年,私营商业在边区还是拥有绝对优势,如下表

表2:1936年—1940年延安私营商户发展及资金分布

年度	商户总数	资本总数(元)	10万元以上商户	5万元以上商户	1万元以上商户	五千元以上商户
1936	168	40000		2	5	161
1937	204	70000		7	12	185
1938	233	250000		10	18	205
1939	262	400000	2	17	29	214
1940	297	1100000	7	25	38	225

资料来源:《延安市公私商店调查登记表》,1944年 &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图表2可以看出:直到1940年,公营商业资本总数并没有比私营商业资本总数显示出特别优势,私营商业在资本周转和经营规模上仍能和公营商业抗衡,而且在商户的分布和市场操作灵活性上远大于公营商业。

但是,1940年后,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和支持下,“1941年延安市光华商店营业总额达8931531.92元。获毛利1949267.14元,纯益1146098.69元。……资本上半年为100万元,下半年为60万元,平均资本80万元,利润占资本143%以上”。^③在资助财政方面,“1941年延安光华商店整批供销公家的物资如布匹、纸张、文具、工厂器材、化学原料等总值7804804.77元”。^④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全部自给过渡,边区政府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各机关部队也开始经营商业,出现了公营商业单位化的繁荣发展局面,私营商业虽然也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但与公营商业相比,已经无法与之抗衡。

在全面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伴随着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农业、工业及交通运输业都得到了不断发展。到1944年底,“在工业方面,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袜子、纸张、陶瓷、纸烟、蓝、铤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⑤同时,政府对商业发展的强化管理,为公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公营经济得到进一步壮大。在边区的商业资本中,公营商业的资本已占绝对优势。“1944年延安市67家公营商店所拥有的资本占473家私商所拥有资本的50%”。在绥德分区,1943年共有公私商店478家,资本总数17973万元。公商40家,资本11825万元,占65%。私商438家,资本6148万元,仅占35%。在纯利润方面,公营商店也占压倒优势,

① 拙文:《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事业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2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99页。

③ 《光华商店去年营业800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月10日,第4版。

④ 《光华商店去年营业800万元》,《解放日报》1942年1月10日,第4版。

⑤ 赵棣生:《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解放日报》1945年1月4日,第2版。

该年公私商纯利共 53034 万元,公商 49629 万元,占 93%,私商 3405 万元,仅占 7%。公商的纯利占其资本的 419%,而私商的纯利仅占其资本的 55%,即 7.5 与 1 之比。^①

私营商业数量增加但资产比重逐步缩减,一方面说明了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发展边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 私营商业商品种类、业务性质变化

边区私营商业的经营经历了从纯商业性商户到作业性商户^②的转变,商品的种类也由成品向半成品、原料和土产品转换,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分析。

其一是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而导致了外货的中断。抗战爆发前后,由于边区轻工业生产的缺失、商品的匮乏,商业贸易主要依赖于外来进口,而进口的多半是工业成品,布匹与杂货,尤其是布匹和杂货的数量居多,同时,还进口少量的奢侈品。

1940 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经济的封锁,外来货物的进口开始出现困难,皖南事变后,进口货物一度搁浅,在延安市的各个商店,“土产品慢慢代替了外货,光华皂代替了日光皂,羊毛线衣代替了舶来品”^③,边区生产的纸张、毛巾、牙粉、皮衣、布匹、鞋帽等则成了商店出售的主要产品。

在商业业务性质的变化上,绥德市尤其突出,1937 年全市“一般商业性生意 133 户,工业性生意 12 户,奢侈性生意 10 户”^④,也就是在 155 户商号中,纯商业性商号 133 户,占 85.8%,作业性商号仅 12 户,只占 7.7%,奢侈性商号 10 户占 6.5%,几乎与作业性商号相等。但是 1941 年边区纺织业中心由吴堡转到了绥德,并被称为“陕北的曼彻斯特”^⑤,一些纯粹的商业性商户也开始从事棉纺织工业。到了 1943 年,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下表则反映出绥市私营商业业务性质的转型。

表 3: 绥德市 1937 年-1943 年私营商户业务性质变化图

年份	商业性的生意户及所占比例	奢侈品的商业户及所占比例	工业性的生意户及所占比例	总数
1937	133(85.8%)	10(6.5%)	12(7.7%)	155
1942	100(73%)	2(1.5%)	35(25.5%)	137
1943	103(65.2%)	1(0.7%)	54(34.1%)	158

资料来源:赵艺文:《绥德商业业务性质在转化》,《解放日报》1944 年 4 月 29 日,第 4 版(注:图表中 1942 年 137 户中公营商店占 26 户,1943 年 158 户公营商店占 29 户)。

图表 3 说明,奢侈品和纯商业性商户正向着工业性商户,也就是作业性商户转化。不仅绥德如此,其他地区的商业业务性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边区 1943 年的统计显示,“靖边的私营商业 28 家,其中作业性的占 10.7%;临镇的私营商业 48 家,其中作业性的占 33.3%;富县的私营商业 151 家,其中作业性的占 20.5%”。^⑥ 1944 年,“延安私营商业 473 户,其中作业性的占 33%”。^⑦

其二是边区各种工厂的建立,实现了经济的基本自给。1943 年后,随着边区各种手工业、轻工业工厂的建立,大量商品实现了自给。边区政府在进口贸易中采取了保护政策,限制或减少一些商

①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 年 2 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 430 页。

② 作业性商号:指那些自产自销、产销结合商户,如小手工业、铁木器铺、成衣铺、皮房、织袜铺、鞋铺等。

③ 《新市场小影》,《新中华报》1941 年 1 月 9 日,第 4 版。

④ 赵艺文:《绥德商业业务性质在转化》,《解放日报》1944 年 4 月 29 日,第 4 版。

⑤ 《绥德贸易金融动态》,《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22 日,第 4 版。

⑥ 物资局:《边区六个市的商业调查统计》,1943 年,《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 4 编,第 386-387 页。

⑦ 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 年 1 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 4 编,第 300-301 页。

品的进口,如下表:

表 4: 1944 年几种入口工业品减少的比例(以 1943 年为参照)

物品名	百分比	物品名	百分比
棉花	72%	迷信品	18.3%
纱	62%	肥皂	0%
毛巾	18%	消耗品	20.3%
袜子	13%	铎	79%
火柴	54%	文具纸张	21.4%

资料来源:边区财政厅税务总局:《税收工作总结》,1945年,《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边区进口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反过来鼓励了私营商户更好对经营作业性商号。作业性商号的增加,与边区的自给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标志着边区市场的性质正在发生着变化,其对外依赖性逐渐减弱,独立自主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如绥市此时“输入的货物亦有成品的洋布杂货,逐渐转为棉花、洋纱等原料品与半成品”^①,由此可见,原来纯粹经销外来成品的消费性市场已转变为以经销原料和半制成品为主并推销边区产品的半独立市场。

三 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的管理

边区政府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实现了从放任自流——管理困境——到统一领导的发展转型,使其成为边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 推进边区籍商户发展私营商业

边区政府最初对商业发展的有意识管理就是鼓励边区籍商户学习和经营商业。

外籍商户资本在边区商业史上一直占有优势。如延安在1925年前没有一家本地籍商户,至1925年后始有少数豪绅地主转营商业,到1936年外籍商户还占总商户的52%。边区政府大力扶植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外籍商户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到1940年仍占40%。如表5,可以反映边区外籍私人商业比重的下降。

表 5: 延安市外籍和本区商户 1936-1940 年变化表

年别	外省	各县	延安市	合计	外籍占
1936	87	49	32	168	52%
1937	94	59	51	204	46%
1938	114	55	64	233	48%
1939	117	66	79	262	44%
1940	120	99	78	297	40%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图表5一方面反映出经过土地革命后的边区经济在“修养民力”方针下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

① 赵艺文:《绥德商业业务性质在转化》,《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第4版。

展,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贸易的方针和管理是谈不到的,对内对外贸易都是自流的”。^①另一方面,私营商业中外籍商户占有很大的比重及外籍商户资本的集中,说明边区内市场联系的密切。

边区政府对本籍私营商业的鼓励和支持,折射出边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一是边区商业经济的对外依附性严重存在,“边区商业的发展必将受到外部市场兴衰变化、物价的涨落、金融的波动,以及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极为敏感的影响”。^②其二是边区自己的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农业、手工业、制造业还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边区内部缺乏应有的商业必需品和支柱产品。其三是边区在私营商业的发展上还处在管理的盲目状态,没有形成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与此联系的是,边区私营商业分类中,京货商与过载栈特别发达,而这些京货商大多是外籍人经营,“过载栈也多是山西人经营的,本地人经营很少”。^③同时,外籍商户的资本非常集中,如延安有名的山西籍“十大家”即拥有资本150万元至170万元,占1941年延安市私商资本710万元的40%。这些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发展边区籍私营商业、推进边区经济良性发展的思考。

(二) 政府对私营商业管理的困境

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整个商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冲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边区政府提出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力求最大限度的缓解边区经济的压力。同时,1941年1月1日,政府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公布商业税及货物税条例》,明确提出:“凡在边区境内开设商店摊栈客房旅馆等,不论公共私人,新开和旧开,不论年季月或临时贸易等,均应缴纳商业税”^④,税率的高低按纯收益的高低累进。但是,由于私营商业的投机性和灵活性,使中小私商户保持着很强的发展势头。私商根据自己的经商经验和本领,利用金融物价的波动,利用和区外的广泛联系,利用公营商业混乱状态作掩护而囤积居奇,投机黑市,对边区金融物价造成很大的波动。

为了加强对商业的管理,特别是私营商业的控制,确保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平衡,边区政府提出了“法币禁用,边币畅流”,其目的“一是为着边区实行经济自给,限制外货入境,刺激边区生产;二是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⑤2月份,边区政府贸易总局正式恢复,但边区政府在规定贸易局性质上职能不明确,把贸易局即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又作为“业务”机关。在贸易局制定的“八项任务”中,对于如何加强统一管理又未作任何具体规定。作为政府对外贸易的领导机关,既然没有管理的权力,“管理贸易”也只能是形同空文。

边区政府试图从各个方面实现对边区商业发展的控制,但实际上在市场潜在的规律面前,仅靠行政命令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在法币禁用问题上,陈云谈到:“陕甘宁边区是处在和平的商业环境,只有一些小摩擦,基本上是和平的,国民党的票子不叫敌钞,叫友钞”,“脱离法币不行,……因为边币跟它交换,和它发生关系”。^⑥1941年4月18日,边区政府作出通知:“为使人民能便利购入必需品……准许人民自有法币不经申请及检查的手续,得自由出境,但边区内仍不准法币在市面流通,违者处罚。”^⑦

1941年5月1日,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贸易工作决议》,决议不仅提出了反对私人资本垄断,同时也不赞成用国家资本或权力来垄断或统制。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由于商业行政机构的不健

① 物资局:《贸易管理工作的检讨与今后工作计划》,《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87-88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96页。

③ 刘潜:《延安私营过载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9日,第4版。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册,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使用法币的通知》,1941年2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册,第69页。

⑥ 陈云著:《陈云文集(1935-1949)》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404页。

⑦ 《陕甘宁边区政府准许人民自有法币可自有出境的通知》,1941年4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册,第144页。

全,规章制度本身的漏洞及执行中的不力,致使边区政府对于私营商业的管理软弱无力,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由状态。在税收方面,“边区的税收工作各种制度手续等,还不够完善,办事总是慢的很,公私商店一律照章纳税,还不是完全实行”。^①在对外贸易上,尽管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保护政策,禁绝奢侈品的入口”,“增进边区内部商品流通,满足人民日常用品需要”^②的政策,但收效甚微。可以说,从1940年到1941年,政府的贸易工作几乎处于“自由管理的彷徨”状态,贸易政策“充分的表现了这一思想上的犹豫”。^③

政府对私营商业管理上的困境,客观上由于皖南事变后,边区面临经济发展的危机日重,金融物价空前不稳,各单位基本上都处在分散经营,自产自给,解决吃饭及工作日用必需品。私营商业尽管存在着投机买卖、囤积居奇,甚至走私敌货、贩卖毒品的现象,但对于缓和边区所需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主观上由于部分同志对于急剧变化的形势缺乏思想准备,他们满足于分散经营解决了局部困难,反对进行统一管理,“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完全采取放任态度”。^④“不主张在商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商业,使它在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上起主导作用”。^⑤正是这些原因,边区政府在私营商业问题上“想管理而又怕管理,决定管理又管理不了”。^⑥

(三) 成立物资局,统一领导私营商业

1942年后,边区政府在商业的管理上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强化了政府监控力度。如:针对烟草进口对边区民生的影响,1942年1月14日,政府命令:“纸烟一项,并非生活必需的用品,对于身体既没益处,对于金钱却是很大的消耗,……影响民生经济,实在非常重大。……自一月十五日起,任何种类纸烟,除过境者外,一律禁止入境。”^⑦这一政策一直到1943年7月才取消,后来,政府又在1944年2月8日再次禁绝外来纸烟进口。

1943年2月3日,边区政府第四十次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组织暂行规程》,并宣布正式成立物资局。物资局归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但其行政上仍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是边区政府的职能部门。物资局总局设在延安,各地原贸易局分局、支局改为物资分局、支局。《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组织暂行规程》明确规定,边区物资局统一管理边区出入贸易、物资、物价,其任务是:统一管理与加强出入口贸易;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协助财政保证实物供给;加强管理物资与商业;辅助国民经济的发展。^⑧同时,还明确了物资局的职权范围,强化了对边区商业的有效管理。

物资局成立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加强了对商业,特别是私营商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同时,着手整顿公私商业,加强对边区市场的管理。1943年,边区物资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根据边区实际所需,把进出口货物分为允许、特许、禁止三种^⑨,并报陕甘宁政府批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必须与非必须之进出口货物也作了具体调整。

在私营商业的整顿上,主要是整顿商会组织。1943年,边区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造,在政府的

① 王富才:《一个商民的意见》,《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第4版。

②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动员边区全体人民拥护边币平抑物价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345页。

③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12页。

④ 叶季壮:《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10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12页。

⑤ 物资局:《贸易管理工作检讨与今后工作计划》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12页。

⑥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212页。

⑦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颁布贩卖纸烟惩治办法》,1942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册,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⑧ 《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组织暂行规程》,1943年2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册,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⑨ 《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册,第236页。

领导下改组了商会委员会,增加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店员的名额。如延安商会 1943 年的改组:

表 6: 1943 年延安市商会组织改组后的人员、阶级、党派、职别一览表

姓名	王克温	张坚中	孙永福	井泉旺	阎静安	赵占秀	郝作民	周鸿温	乔松林	高相传	雷银城	杨玉山
阶级	大商	工联会	中商	中商	中商	小商	工人	中商	中商	小商	工人	大商
党派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职别	会长	付会长	付会长	调查委员	调查委员	教育委员	教育委员	委员	委员	卫生委员	卫生委员	总务委员

资料来源: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 4 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2 页

改组后的延安商会,选出的 12 名委员中,店员 2 名,中小商人委员 7 名,占绝对多数,大商仅占 2 名,工联会以集体会员资格参加商会工作,并担任副会长。12 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 7 名,商会改组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商会组织的领导。在商会的性质问题上,边区政府对其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指出了商会“实际上应该是商人职业性的群众团体,它不能代替政府行政,同时,政府也须要尊重它的独立性”。“商会的工作应该照顾注意到人数最多,如小商、店员、手工业者等基本群众的利益”。^① 1944 年,边区政府制定了商会组织条例,各地政府先后根据这个条例组织商会,以大、中、小商人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吸收中小商人参加商会的执委会,纠正了大商人包揽一切的现象,使商会成了各界商人的群众组织。

经过整顿的边区商会组织,响应政府的号召,接近了群众,发扬民主、分摊负担的商户都较以前进步。在调剂物资、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在商会的领导下,私营商业人员还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如创办民办学校,兴建厕所,修筑道路等。私营商业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为活跃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执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来说,制定和颁布有利于私营商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并通过实际操作有效帮助私营商业发展,恢复边区商业繁荣,是中共对执政边区发展私营经济的尝试。在对私营商业发展的引导、管理和制度安排上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营私营商业的历史选择,反映了边区政府在实践中对面临的每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及中共领导私营商业发展的强烈社会主义意识。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经济的兴存考析,可以作出一个结论:私营商业的发展从边区一种生存的自发需要转而寄系出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考。尽管其一直处于旺盛的发展状态,然而,它无法摆脱经济发展辅助地位的历史命运。私营商业的不平衡分布、作业性商业的逐步扩大、大商户的消退和中小商户的崛起成为中国革命年代根据地私营商业发展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边区私营商业在公有制精神的感召下最终踏上行政化的轨道,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给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作者魏建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高尚斌,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 4 编,第 398 页。